

# 韩国农村工业化政策：回顾与展望

【韩】金 鍾 基

(韩国开发研究院)

一、导 言 韩国人口的大多数仍居农村且以农为生。同台湾、日本那种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部门的情况相比，农业部门仍是韩国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以往政府对农民收入的政策主要是通过二元谷物价格计划和化肥价格补贴计划来支持农业价格。从某种程度上讲，尽管政府政策已经帮助增加农民收入，但它却带来了大的政府预算赤字，并且可能由于在国民经济中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而损害了农民的实际收入。由于这些人为了价格支持计划延缓了促使农业经济向更为多样化和更富竞争力的结构变化的进程，从而对农业部门带来了额外的负作用。

然而，正是小规模农业经营成为农业发展最严重的桎梏。1989年，韩国平均农场规模是1.2公顷，91.0%的农民拥有的农场规模不到2公顷。这种小规模经营不仅制约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几乎不可能增加农业收入。

因此，从长远观点看，对于稻米和大麦的这种二元价格政策应被取消，代之以能够扩大非农业收入来源的政策。相应地，作为促进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战略，农村工业化已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农村工业化能够给农民提供在非农部门就业的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并利用农村地区未开发的人力资源。尽管已有许多计划被用来发展农村工业，然而，它们对乡村工业发展和增加非农业收入的作用甚微。只有1983年以来开始实施农村工业团地计划

信息和技术设施的前提。高技术劳动力的供应，利于培养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生存的区域运营环境的形成及投机资本的产生也是重要的条件。但是，作为提供高技术劳动力、技术信息、富有创新精神的子公司和新公司及其研究开发活动地的研究大学的作用不能过分强调。

在国际尺度，应该强调在东亚形成高技术发展的等级体系结构和国际合作。目前的状况是，在韩国高技术工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进口上，日、韩仅存在单向关系，日本占主导地位。随着在高技术研究和开发活动中两国合作的进一步展开及科研人员的进一步交流，日、韩之间应建立双向关系。同时，也应建立和促进中、韩双边关系及日、韩、中高技术工业发展方面的多边关系。重要的是，要使东京—汉城—北京轴成为东亚高技术工业多边关系发展的核心，应在该轴上联合并建立国际化的集约电信和计算机网络，并使这些网络与各国的城市和区域系统相连。位于东京—汉城—北京轴大都市区的高技术工业的附聚应该通过研究和开发活动的合作，高技术工业在垂直和水平方向上的结合，高技术工业部门前向和后向的空间联系以及对制造业系统灵活性大的优点的有效利用来加强多边关系。

当高技术工业发展的多边关系在东京—汉城—北京核心轴上得以建立时，为推进东亚地区高技术工业发展的多边关系，应加强东亚各国，尤其是中、韩两国的主要大城市的国际化水平。为达此目的，应刻不容缓地在东亚主要区域或大城市建立国际合作的技术和信息基础设施。应充分发挥本地区各国各区域高技术工业发展的优势和潜力以缩小本地区国家间的差距，东亚地区各国间差距的缩小对于本地区所有国家的全面发展和增长有重要意义。

(武 伟译)

才使农村工业化有了长足的进步。本研究的目的是：回顾以往的政策，评价农村工业化发展的现状并找出其潜在的问题，预测发展方向。

**二、韩国经济结构的变化** 作为其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实施结果，韩国经历了迅速而剧烈的经济结构变化，并成功地使其经济从以农业为主体的结构转变为以工业为主体的现代市场经济结构。1962—1988年，在国民生产总值构成中，制造业从16.2%增加到33.2%，农业、林业和渔业则从36.6%下降到10.5%。

在向工业化快速迈进的同时，韩国城市化水平也得以迅速提高。1960—1988年，城市化率从28.0%上升到73.7%；同期内，城市人口年增长率为5.4%，农村人口年下降为1.7%，这主要是由于大量农村人口移向城市所致。当首都区（汉城、仁川和京畿）和釜山由于净迁入而人口增多时，所有其它省的人口均减少。1960—1966年，净迁入人口对于城市总人口增长的贡献近乎等同于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在60年代后半期，净迁入人口的比重上升到75%左右。

人口分布上的这些变化部分地决定于韩国工业化过程的特点。近30多年来，制造业部门在韩国经济增长中起着主导作用，从事制造业的人口的比重几乎提高了三倍，制造业部门的产量提高了两倍。1960年，从事制造业的职工占总职工人数的7.5%，制造业产量占总产量的17.0%；到1985年，上述两个指标分别增加到24.2%和29.9%。在1971—1988年间，从事制造业的公司数目增加了2.1倍，整个制造业增加了3.2倍；而且，新制造业公司更向城市区域集中，在1971—1988年，位于城市区域的制造业公司的比例从54.4%上升到75.6%。

1970年全国农村工业的区域分布相对均匀，到1980年，这种分布便变得极不平衡了。在1970年，农村制造业公司的17.8%分布于全罗南道，15.5%在京畿道，15.1%在忠清南道；到1980年，当几乎所有其它地区的制造业公司的比重下降时，京畿道（包括汉城）的比重增加了30%强；在同期内，京畿道的制造业的就业增加了4倍多（已占全国制造业就业总数的40.9%），其它地区或是低增长率，或是就业和公司数目均无增长。通过对位于汉城——釜山轴上的城市与位于其它区域的城市的比较也能发现这种分布规律，在1971—1980年，位于汉城——釜山轴上的城市占全国制造业就业者的比例从79.2%上升到89.5%，公司数由62.0%上升到84.3%。

对不同区域的区域收入和生产分布的分析也明显地发现了这种差距。按人均区域产值计算，位于汉城——釜山轴、京畿道和庆尚南道（这里已建立了许多工业团地）的城市是韩国发展政策的主要受益者；相反地，其它区域（尤其是全罗北道和南道）落后。

收入数据同样表明，60年代农村农户和城市工资收入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到1973年，该差距已被缩小——农户的收入已经赶上了城市工资收入者。由于调查数据的局限性，尽管要得出城乡住户间的收入差别在1973年初已全部消失的结论是很危险的，但是，以后的研究工作却证实了这样一种趋向——即城乡住户间的收入尽管在早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自1960年以来已极大地缩小了。尽管收入指标只显示出很小的差距，但是，其它指标诸如社会和经济基础（前者包括住房、教育、医疗和文化设施等，后者包括道路、电话、给排水设施等）表明城乡差距依然很大并仍在扩大。

**三、政府政策回顾** 60年代，汉城和其它城市中心经济力量和人口的日益集中及城乡差距的日益扩大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注意。为适应这些结构变化，韩国政府试图通过直接提高农业收入和农产量来缩小城乡差距。早期用以增加农业收入和农业生产率的措施包括农产品的二元价格体系和为促进农业机械化、化肥化水平的提高及灌溉条件的改善所设的补贴。

在二元价格体系下，通过“谷物管理基金”提供补贴，韩国政府先以一定的价格收购谷物，再以较低的价格卖出。久而久之，政府统购价和市场价间的差距增大并导致基金长期赤字，1971—1988年，赤字总计为32,909亿韩圆（约计46亿美元）。由于这些赤字多借之于中央银行，故被看作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包袱；而且这些赤字本身加大了国家通货膨胀的压力，影响了农民的实际收入。二元价格体系可能会延缓能促进农村经济更具竞争力、更多样化所必需的结构变化的进程而对农业部门有长期的负作用。

韩国政府用补贴农业的办法来促进农业机械化、化肥化水平的提高和灌溉条件的改善以提高农业生产率。然而，这些政策的作用微乎其微，因为土地改革政策所规定的小规模农场经营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土地改革法（LRA）规定了农场规模的上限（约3公顷），禁止自由交易合并农场并限制田地出租。结果，由于农民得不到与大农场相联系的规模经济的好处，也就不能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率。小规模经营限制了农业机械的使用进而限制了每个农场的产出规模并使生产费用增加，因为适于多种可节省劳力的农业机械使用的的不亏不盈的农场规模要比原有规模大得多。据计算，即使在现有的对农业机械40%补贴的条件下，对于插秧机、联合收割机和拖拉机来讲，不亏不盈的农场规模分别是2.9公顷、4.5公顷和9.5公顷。要提高农业生产率并增加农业收入，就要允许把农场增大到可以使用能节约劳力的机械的规模。

**四、农户的收入结构：韩国、台湾和日本的比较** 农户的收入可被分为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农业收入是指从农产品的生产中得来的收入，非农收入包括副业收入、工资和薪水、地产收入和捐赠。1962—1987年，韩国农户收入中农业收入的比例持续下降（1962年为80%，1987年为61.4%），非农收入的增长多源自工资和薪水、地产收入和外来收入。农场规模和农户收入构成的关系是，当农场规模增大时，非农收入的比例下降。1987年，农场规模不足0.5公顷的农户的73.4%的收入为非农来源，而农场规模大于2.0公顷的农户仅有19.2%的收入为非农来源。

韩国实施的是对农产品的二元价格补贴计划，而台湾农业政策的重点则在于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1966年，平均台湾农户收入的66%源于农业部门，34%源于非农业部门；到1989年，台湾农户收入的75%强源于非农业部门（最重要的是工资和薪水）。日本与台湾类似，1962—1988年，农户的收入构成中非农收入的比例由48.6%上升到83.5%，工资和薪水同样是非农收入中最重要增长源。

以日、台经验为例，韩国政府也将其农业政策的重点从强调支持农业价格放到重视扩大和丰富非农收入来源上来。通过在非农部门给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并利用农村未开发的劳力资源，农村工业化被认为是提高农户收入的有效途径。

**五、对以往农村工业政策的评价** 起初，作为农村发展政策的农村工业化采取了多种形式。1967年，农户副业园计划（FHSBPP）通过促进传统农村制造业来增加非农收入。每个副业园都使用当地可得的原材料来生产诸如民间工艺品、纺织品、不太复杂的家用品和农产品之类的简单项目。该计划以借贷和税务优惠的形式资助工厂建设与购买机器。

该计划对农村发展的贡献很小。大多数的副业园规模小且吸收农村劳力少。1982年，仅有235个副业园开工，平均雇用工人12.3个；其中1/3是中、小型工厂，其余则是更小的或者是村舍手工作坊。由于它们主要依靠低技能劳力及陈旧低效的机器工作，这些副业不能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或改进产品质量。

1980年，韩国有908个民间工艺制造企业，占全国中、小企业总数2.9%，拥有工人2.3万

名。为发展传统的民间工艺品制造业，韩国政府从这些企业中选定了98个作为发展专业化的民间工艺品制造业潜力的战略生产者，这些企业大多数是在私人家中开业并利用传统手工技术的小村舍作坊。被选定为战略民间工艺品生产者的公司可优先获得银行贷款和技术、管理方面的帮助。然而，该计划对农村工业化的贡献十分有限。仿制品和代用品的大量出现，对传统手工技术的依靠，使用地方原料等限制了传统民间工艺品的市场规模，很少能刺激技术革新或产品质量改进。

1973年开始实行的Saemaeul工厂计划是首次全面吸引制造业企业和工业投资到农村来的尝试。纳入该计划中的Saemaeul工厂雇用当地剩余劳力并使用当地原料其目的在于使工业活动远离已过于拥挤的城市（特别是汉城和釜山大都市区域），并为农村居民提供非农业收入来源和工作机会。该计划向位于指定农村地区的有发展前途的公司提供一套金融和税收优惠及其它方便，例如，免除有些税款，允诺建立一定的设施等。该计划规定的具体目标是，在每个不足2万人的农村社区建立一个Saemaeul工厂。

然而，从工厂数量方面看，该计划是不很成功的。1984年，在选定作为Saemaeul工厂的1357个企业中，仅有一半目前正在运营。而且在Saemaeul工厂中，金属制品和机械等高增长工业的比例低于全国水平。研究表明，对于开工能力不足80%的工厂来说，劳力缺乏是最严重的问题。

尽管这些早期的农村工业化计划在提高收入的非农来源方面作用甚微，但它们的确揭示了农村地区发展工业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并对制定未来农村地区工业发展政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事实证明，农村地区工业发展政策要对农村收入和就业产生重大影响就必须协调两个目标：a)政府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应严格限于农村地区的农户；b)农村工业政策的目标应是把工业吸引到指定的增长中心。

以往的农村工业政策总是未能使那些政策的制定者期望要帮助的人们从中受益很多。1988年，21.4%的制造业公司是农村企业，其职工人数占制造业职工人数的20.5%。但是，因为许多这些农村企业在地理分布上集中于围绕三大都市区（汉城、釜山和大邱）的各道，故此，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村工业。Saemaeul工厂计划已开工的企业中，几乎75%集中于京畿道和庆尚北道、庆尚南道，而且其中大多数接近汉城、釜山和大邱三大都市区。引导公司向这些地区移动的农村政策很少能对提高农民收入和增加就业有益。

此外，以往的农村工业化政策未能为应受益地区提供必需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以吸引企业和劳力。在Saemaeul计划中，政府用于筑路投资的大部分用在了联结大城市间的道路修筑上，而真正用来修筑引导这些Saemaeul工厂的农村道路网的资金却很少。这不仅使得原材料及成品装运费用高，而且也使得农村居民不便于到附近可得到就业机会的工厂工作。同时，这些农村地区能够提供的服务如银行、市场、信息加工很少。例如，Saemaeul工厂苦于难于获得最新的市场和技术信息和银行信用贷款。在每个村和集镇建设一个工厂的计划目标是宏伟的，但执行结果表明，该计划规定的发展农村工业的基本规划单元太小。

**六、农村工业团地计划：实施状况和评价** 鉴于上述经验教训，1984年制定了农村工业团地计划（RIE）。和Saemaeul工厂计划要求一村一厂不同，该计划要求在若干农村人口中心建立工业团地。这些中心要能够充分有效地提供基础设施和服务以形成一个良好的运营环境，以便农村制造业公司在这些团地集中并雇用附近工人。

与Saemaeul工厂计划相比，农村工业团地计划给予那些欲在农村地区布局的公司以更多的优惠和补偿，例如免除所有税务并优先贷款。迄今为止，农村工业团地计划在建立农村制

制造业基地方面执行状况好于Saemaoul计划。农村工业团地中工业园和工厂数量正在迅速增长,并且,许多工厂和工业团地集中于诸如金属、机械及机器生产之类的高增长工业。1990年,位于农村工业团地的企业中,27%属于机械和金属生产、16%属于电气制造、16%属于纺织、11%属于化学和塑料生产。到1990年,在已计划要在191个农村工业团地布局的2330个工厂中,有620个已投入运营。农村工业团地计划建立的工厂在全国各道的分布表明,大多数工厂已被布局在忠清北道和南道而非汉城或釜山区域。

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农村工业团地计划的实施情况: a) 实施农村工业团地计划产生了多少就业机会; b) 农户收入增长了多少; c) 农村工业团地对整个区域发展的贡献多大。

在目前实施阶段,要对该计划产生的新就业机会的数量进行全面评价为时尚早。迄今农村工业团地已雇用了大约3.5万个当地居民,该数字低于政府的期望值,这反映出位于农村工业团地中的工厂想雇用更多的大都市地区的劳力,仅把当地居民作为闲散劳力使用。因为在农村工业团地中的工厂在雇用合适的农村劳力方面困难重重,因此,许多农村工业团地中的工厂就不得不从大城市雇用其所需的熟练劳工。然而,目前尚无法预言这种趋势是否会持续下去。在农村地区新建的工厂必然会从外地带去自己的业务经理、技术员和熟练工人,一个工厂大约需要3—4年才能完成建设并开始全部使用当地的劳力。

70年代初,日本也有过类似的农村工业化过程。当时日本农村工厂的情况是: 开业已二年的工厂中仅有48%工人是当地的居民,开工五年或更长时间的工厂使用当地劳力的百分比是85%。研究表明,韩国也有类似的倾向。在1987年开工至今已4年的工厂中有61%的工人来自当地; 1986年开工的工厂中72%来自当地,1984年开工的工厂当地工人可达83%。可以预料,随着农村工业团地就业和规模潜力的全部实现,该百分比会上升。到1991年,政府计划发展到350个农村工业团地,其就业总数可达100万人。如果计划成功,每两个农民中就有一人在农村工业团地工作。

尽管迄今尚难明确测定农村工业团地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但人们普遍相信该计划在扩大非农收入来源和全面提高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87年,农民收入中非农收入的比例已从农村工业团地计划实施前的1983年的35.0%稳步上升到38.5%; 与此同时,农民收入提高了27%——年均增长6.2%。然而,农村制造业公司中工人的工资水平仍然远远低于制造业部门的全国平均水平和农业工人的薪水。1990年,一个在农村工业团地中工作的工人的月均工资为32.3万韩圆(约450美元),仅为制造业部门全国平均工资水平66%。例如,在Gongju市的农村工业团地占地面积26,000坪,雇用了1600个当地农村居民,农村工业团地中所有工人总计年工资为40亿韩圆(3500美元/人),相当于该市所有稻米的生产量。

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农村工业团地对区域发展作用显著。作为农村工业团地计划实施的结果,在农村工业团地所在区域铺设了更多的道路,安装了新电线,建设了更多的服务设施。农村工业团地计划极大地改善了旺盛的经营环境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道路和通讯设施),结果使农村工业团地工厂不再为缺乏好的道路和通讯设施而对工人、原料和产品运输发愁了。

通过提供各种鼓励措施,农村工业团地成功地克服了在农村地区布局的缺点。由于高地价和严格的土地利用法规所限,中小型公司要在城市内买到厂址是很不容易的,而农村工业团地则是这些公司进行再布局或再建工厂的可能选择。

农村工业团地计划给了地方政府更多的决策权和更多的管理和金融方面的支持来发展这些农村工业团地。鉴于以往的经验,现在,地方当局在进行有关工业团地的规模、区位和组

成等方面的决策时显得更为称职。

**七、农村工业团地计划所面临的问题** 无论如何,农村工业团地计划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70年代的农村工业化政策强调农村工业的布局方面却忽略了保证这些布局成功所必需的先决条件,最重要的是只有在那些能够提供必需的基础和服务设施以吸引农村工厂的最佳区位才能被用未建设农村工业团地。目前存在的问题是,选定的区位点太多,而这些区位点选定所主要考虑的不足经济因素而是政治因素。因此,已选定的区位点的数量应予减少以使农村增长中心能集中在比遥远的小村庄更易于进行工业活动的中小型城市中。目前,农村工业团地计划在不发达地区实施的结果并不理想。许多被选定的中心就位于首都区和东南部附近的工业区内。如果农村工业团地要为农村发展发挥大的作用,其工厂就必须布局在那些适于经营活动的农村地区。

此外,重要的是这些农村增长中心要有好的通达性。以往农村工业化经验表明,劳动力缺乏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使劳力、原材料和制成品快速、廉价运输,就应围绕这些团地建设交通运输网;为保证足够的劳力供应,应首先铺设好连接工业团地与相邻城镇的道路以便于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为有效地协调规划,应选定一个包括主要增长中心及其边缘地区在内的综合区域规划带(IRPZ)作为区域规划的单元,并按运网的能力确定其边界。

同时应鼓励可获得规模经济效益的大公司在这些区域布局。大型工业综合体建设的实践证明,仅靠大型公司不足以保证成功的增长。布局于边缘地区的许多大公司不很成功的原因在于缺乏适当的管理技巧和技术知识。作为一种选择,或许地方政府应该更注意吸引分厂或已经建立的大企业来这些地区建厂,应鼓励具有管理和技术知识的大公司在边远地区布局。

单独建立农村工业增长中心尚不足以保证它会对农村收入和就业有重大的长期作用。为更好地支持有发展前途的农村工业发展,应该有与农村工业团地计划相配套的其它政策措施以更好地处理以往农村工业团地建设中所遇到过的问题;尤其是由于地方银行机构数量有限且服务质量差,位于农村地区的中小型制造业公司经常遇到资金缺乏问题。因此,大都市银行应在农村中心建立更多的分行以便为当地的中小型工厂提供所需的金融服务,应对规模小却有发展前途的公司从更多的方面给予信用贷款。

即使农村地区劳力供应充足,能否有效利用尚很难肯定。应在农村地区建立职工培训中心、就业服务系统和岗位培训计划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和培训工人。

农村工业团地的主要区位优势之一是难于从其它地区得到并处理最新信息。这不仅是因为交通运输落后,而且由于缺乏先进机器和高级熟练工人。要跨越这个障碍,就要建立一个综合服务中心以收集、加工并整理关于市场、技术革新和管理方面的信息。

最后一个是农村工业团地计划与西海岸发展计划之间的潜在冲突。1991年西海岸发展计划仍处在规划阶段。西海岸发展计划不仅表明韩国政府正在努力解决大的区域差异问题,而且也说明她要充分利用21世纪变化着的外部条件。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西海岸地区(包括忠清南道,全罗南道和北道及京畿道的一部分)作为主要的贸易中心的重要性已日益突出,为迎接新太平洋世纪的到来,应沿着西海岸发展港口和工业设施以促进贸易和生产的发展。

从宏观布局看,农村工业团地计划和西海岸发展计划的布局政策可能发生冲突。人们忧虑在吸引工厂到各自的区域方面两计划会相互竞争,特别是那些不在西海岸布局的农村工业团地工厂在竞争中会处于劣势;而且,因不位于西海岸而未被列入西海岸发展计划的江原道与庆尚北道和南道的那些大的农业区域可能会因此而不满。为确保以上两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不发生冲突还需作进一步的努力。

(下转第封三)

迅速重新构造的最重要的结果。

**五、结论** 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已采取了一系列冲突的行动，以应付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其结果是东京作为全国管理、研究开发和信息传输中心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勿庸置疑，县级地方政府仍在继续努力吸引大学、研究机构和高技术工业。国家政府工业扩散的政策也未改变。1988年，国际贸易与工业省已开始进行一项为寻求发展县级区域的措施和着眼于21世纪新工业系统的调研。持续的要求减弱东京支配地位的原因就是为减少东京地区可能发生的大地震及其它灾害的损失。

日本的工业将进一步国际化。为保证市场，许多大企业正将它们的工厂向北美和欧共体国家转移。它们的研究开发也同样，大多数大企业将它们的研究部门优先向国外布局，而非向日本县级地区布局。将来，技术密集产品将在新工业化国家制造，劳动密集性产品在东南亚国家生产，高加工费用的高级研究开发产品则在日本本土进行。在此条件下，东京将进一步成为日本及国际上的管理、技术和信息中心之一。同样日本县级工业发展问题不仅需要从日本国内系统的观点考虑，也需要从国际劳动分工的体系来论证。（刘 毅译）

---

（上接第67页）

**八、结论** 正如乌拉圭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所显示的，韩国将在有较大的国际压力的环境中开放其市场并改变现行农业政策。农业部门要经历重大的结构变化以便在新的国际贸易环境中保持竞争力。从长远观点看，政府将会被迫改变其支持农业价格的政策而代之以其它旨在促进农业部门结构变化的政策。农村工业化，正如农村工业团地计划那样，已被作为实现上述目标的途径之一而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然而，农村工业化不能独自成功。它要提供就业机会，要对农村发展有大的贡献，就要有其它的政策措施相配套。

农村工业化计划的前途也决定于它们与其它工业规划的协调状况如何。工业布局政策，如农村工业团地计划和西海岸发展计划，应被综合成一个范围更大的国家工业发展战略以使这些政策能有效地协调、合作。例如，西海岸发展计划是由建设部负责，农村工业团地计划则是在经济计划部指导下由地方政府实施，而且现在又在酝酿一个由贸易和工业部负责的新工业政策。为最有效地利用资源并避免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所有这些计划应被置于国家工业政策总的框架中以求其更有效地协调。

最后，农村工业化必须与区域发展战略中的其它计划相结合以改善不发达区域的生活质量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区域发展。许多农村居民已迁到城市去，不仅是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因为城市有较好的生活条件。因此，在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要注意包括文化发展、医疗和教育设施发展在内的社会基础设施的发展以改善这些区域的生活质量。

（武 伟译）